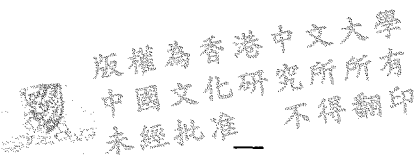




翻譯與階級鬥爭： 論1929年魯迅與梁實秋的論爭*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在中國現代翻譯史裏，曾經出現過一場非常喧鬧的論爭，那就是在1929年底1930年初魯迅與梁實秋所進行的一場筆戰。¹ 表面看來，他們所爭論的，是究竟譯者應該忠實地去進行翻譯，還是可以有較大的自由？這涉及的其實就是翻譯上一個很基本、且時常都有人討論的問題：所謂直譯與意譯之爭。

魯迅主張直譯，這是他一貫的信念。幾乎從最早開始，當他有意識地「別求新聲於異邦」，² 企圖借助翻譯來開啟民智的時候，魯迅便一直主張以直譯的手法來從事翻譯。³ 他這種堅持直譯的信念，比同時代人來得更早，以致他和弟弟周作人所合作翻譯

* 本文為「現代中國作家翻譯研究」及「中國翻譯運動經緯」計劃的研究成果，前者得到香港中文大學直接撥款之資助，後者得大學撥款委員會之甄選撥款資助，謹此致謝。

¹ 其實，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不單屬於中國現代翻譯史範圍，就是在現代文學史裏也佔很重要的位置，有人說它「震撼了整個中國文壇」，見黎照(編)：《魯迅梁實秋論戰實錄》(北京：華齡出版社，1997年)，〈前言〉，頁1。除了這本新出版的論戰文選外，璧華早在七十年代便曾經編選過二人的論戰文章(璧華[編]：《魯迅與梁實秋論戰文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79年])。相對而言，黎照的《魯迅梁實秋論戰實錄》收錄範圍過闊，全書共收論戰文章一百二十五篇，最早的一篇竟是梁實秋在1926年2月，他還身在美國時所寫的〈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而最後一篇則是魯迅在1936年發表的〈「題未定」草(六)〉，這似乎不能具體地反映出這場論爭的內容。

² 〈摩羅詩力說〉，載《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一，頁64。

³ 不過，應該指出，魯迅最早的翻譯活動，基本沒法脫離晚清意譯風尚的影響，他所翻譯的幾篇科學小說，都把原作的意旨大幅改動，而他第一篇發表的作品〈斯巴達之魂〉，甚至不能肯定是翻譯還是創作。直到1909年出版《域外小說集》時，魯迅才開始改用直譯的方法。參看王宏志：〈民元前魯迅的翻譯活動：兼論晚清的意譯風尚〉，《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期(1995年3月)，頁47-59。

出版的兩冊《域外小說集》，面對著晚清以意譯為主的翻譯風尚，銷路極差。⁴不過，對於翻譯，他始終努力不懈，到了1929年底，他共翻譯了超過一百五十篇作品。⁵

同樣地，梁實秋也十分重視翻譯，後來他所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便非常著名。在爆發這場論爭前，他也翻譯過一些作品，不過，他一直沒有正式撰文認真討論翻譯的標準，但在一篇發表於1929年9月題為〈論魯迅先生的「硬譯」〉的文章裏，他猛烈批評魯迅那種過分忠實的翻譯手法，毫不留情地把魯迅的翻譯稱為「死譯」。甚麼叫「死譯」呢？他借助了魯迅的敵人陳西滢所下的定義：「他們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減，〕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後，名曰翻譯，而『譯猶不譯』，這種方法，即提倡直譯的周作人先生都諷之為『死譯』。」⁶他還徵引了魯迅的三段翻譯，加上評語，說「有誰能看得懂這樣稀奇古怪的句法呢？」他的結論是：「讀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綫索位置。」就是這樣，正式揭開了魯迅與梁實秋在翻譯問題上的論爭。⁷

其實，梁實秋的文章題目中的「硬譯」一詞，原是來自魯迅自己的文章的。魯迅除了贊成直譯外，甚至更願意公開承認自己的翻譯是屬於「硬譯」，他「只在希望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⁸但梁實秋卻進一步說魯迅的翻譯是「死譯」。對於梁實秋的攻击，魯迅發表了著名的反駁文章〈「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他依然承認自己在「硬譯」，⁹不過，他另外堅持的一點是：「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¹⁰

⁴ 魯迅自己解釋過，《域外小說集》銷路不好的原因，在於當時的讀者還沒有習慣短篇小說的形式。見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載《魯迅全集》，卷十，頁163。但我論證過，當時的讀者所不接受的，是那種過分忠實的翻譯手法，跟晚清的意譯風尚不脛合（〈民元前魯迅的翻譯活動〉，頁57-59）。

⁵ 參Lennart Lundberg, *Lu Xun as a Translator: Lu Xun'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1903-1936* (Stockholm: Orientaliska Studier, Stockholm University, 1989), pp. 235-57。

⁶ 《新月》月刊第2卷第6、7號合刊(1929年9月10日)，頁1。陳西滢的文章叫〈論翻譯〉，《新月》月刊第2卷第4號(1929年6月10日)，頁1-12。另外，周作人確也是主張直譯的，他在譯文集《陀螺》的序言裏說：「我的翻譯向來用直譯法，……我現在還是相信直譯法，因為我覺得沒有更好的方法。」見羅新璋(編)：《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頁398。

⁷ 在這場有關翻譯的論爭爆發前，魯迅與梁實秋其實在別的問題上——例如盧梭和女子教育的問題——已開展了猛烈的爭論。見璧華：《魯迅與梁實秋論戰文選》，頁14-27。

⁸ 〈《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載《魯迅全集》，卷十，頁299。

⁹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載同上注，卷四，頁208。事實上，在幾個月後，他為自己所翻譯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作序時仍說：「這回也是『硬譯』，能力只此，仍須讀者伸指來尋綫索，如讀地圖：這實在是非常抱歉的。」（〈《藝術論》譯本序〉，載同上注，頁264）

¹⁰ 同上注，頁210。

儘管梁實秋也馬上寫了一篇〈答魯迅先生〉回應，¹¹ 另外，他們在別的問題上還繼續公開對罵，且措辭越來越激烈，但表面看來，除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外，魯迅便沒有再寫文章跟梁實秋直接爭論翻譯的問題了。不過，事實並不是這樣。在差不多一年後，魯迅連續寫了三篇討論翻譯的短文。雖然他攻擊的主要目標是一些「順」的翻譯，而被攻擊的主要人物則是趙景深，不過，魯迅卻巧妙地把梁實秋也拉進來，他這樣說：「在這一個多年之中，拚死命攻擊『硬譯』的名人，已經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師梁實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趙景深教授，最近就來了徒孫楊晉豪大學生。」¹² 顯然，魯迅故意給人一種感覺，就是梁實秋跟趙景深關係密切——梁實秋跟趙景深以至楊晉豪的關係，下文再會討論——這樣，接著他所討論的那些「順而不信」的翻譯，便跟梁實秋有關了。但事實上，梁實秋有沒有提出寧願「順而不信」的說法？在翻譯的標準上，他跟魯迅的差異究竟有多大？在下面的一節裏，我們會首先深入去看看這翻譯的問題。

二

在一般讀者心目中，翻譯首要重視忠實，這看來是無可異議的。¹³ 因此，當魯迅一方面強調自己並沒有曲譯，另一方面又指控梁實秋等人寧順而不信，且以「示眾」方式，展列了幾段錯譯後，¹⁴ 人們自然會認同他的說法。可是，實際的情形究竟是怎樣的？

首先，必須指出，魯迅的對手從來沒有說過「誤譯」、「錯譯」是可以接受的，梁實秋沒有這樣說，就是趙景深與楊晉豪也沒有這樣說過。魯迅說，作為梁實秋徒弟的趙景深的「主張最為明白而且徹底了，那精義是——『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¹⁵ 這「精義」在魯迅的原文中是用上引號的，令人相信這是趙景深的原話；¹⁶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趙景深在〈論翻譯〉中所說的，是這樣的一段話：

¹¹ 其實，梁實秋直接討論魯迅翻譯的文章，還有一篇叫〈論翻譯的一封信〉，是寫給葉公超的，發表在《新月》月刊第4卷第5期上（出版日期缺，頁1-4），不過，那時候，梁實秋已經離開了上海，在青島教書，這篇通信也似乎沒有引起魯迅的注意。

¹² 〈幾條「順」的翻譯〉，載《魯迅全集》，卷四，頁342。

¹³ 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傳統的說法，有時候會流於片面。關於我對文學翻譯標準的看法，參看王宏志：〈忠於原著？——重新審視文學翻譯的「標準」〉，《多倫多翻譯學會通訊》第26號（1997年4月15日），頁i-iv。

¹⁴ 〈幾條「順」的翻譯〉，頁342-44；〈再來一條「順」的翻譯〉，載《魯迅全集》，卷四，頁349-51。

¹⁵ 〈幾條「順」的翻譯〉，頁342。

¹⁶ 事實上，在另外一篇文章裏，魯迅又有這樣的一句，「趙先生的『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的格言」，也同樣是讓人以為這是趙景深自己的說法。見魯迅：〈風馬牛〉，載同上注，頁348。

我以爲譯書應爲讀者打算；換一句話說，首先我們應該注重於讀者方面。譯得錯不錯是第二個問題，最要緊的是譯得順不順。倘若譯得一點也不錯，而文字格里格達，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長串，要折斷人家的嗓子，其害處當甚於誤譯。……所以嚴復的「信」「達」「雅」三個條件，我以爲其次序應該是「達」「信」「雅」。¹⁷

在這段文字裏，趙景深的確表示了對「信而不順」的不滿，也確說過「其害處當甚於誤譯」的話——這種說法對不對是另外一個問題，可是，趙景深並沒有因而主張「順而不信」。同樣地，楊晉豪的觀點也與此相差不遠，他說「翻譯要『信』是不成問題的，而第一要件是要『達』」，¹⁸意思也很清楚，他們把「順」（「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甚至比「信」還重要，但並不是說要提倡「不信」或錯譯，特別是楊晉豪說過「『信』是不成問題的」。

魯迅所用的論證手法，就是硬把「信」與「順」對立起來。他承認自己的翻譯是屬於「硬譯」，也強調自己沒有故意地去「曲譯」，我們不必懷疑這個說法，但問題在於：硬譯跟誤譯並沒有必然排斥的關係，也就是說，以硬譯的方法去從事翻譯，不一定能保證沒有錯誤出現，這其實就是梁實秋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中所說「死譯者卻有時正不妨同時是曲譯」的意思。¹⁹事實上，瞿秋白便曾經善意地指出了魯迅翻譯上的錯誤，而魯迅也欣然接納。²⁰倒過來說，譯得通順，不一定必然會有錯誤出現，更不要說提出通順的要求，並不等如說同意錯譯；所以，魯迅把趙景深反對硬譯的觀點推至說他要求「順而不信」是不對的。

我們今天重讀梁實秋所徵引魯迅的三段譯文，實在很同意他的說法：魯迅的翻譯確是難於理解，甚至可以說是跟中文的慣用語法太相違背的。²¹另一方面，魯迅所指出

¹⁷ 原刊《讀書月刊》第1卷第6期(1931年9月)，現錄自《魯迅全集》，卷四，頁344，注2。

¹⁸ 楊晉豪：〈從「翻譯論戰」說開去〉，《社會與教育》第2卷第22期(1931年9月)，錄自同上注，頁344-45，注3。

¹⁹ 〈論魯迅先生的「硬譯」〉，頁1。

²⁰ 〈關於翻譯的通信〉，載《魯迅全集》，卷四，頁376-79，384-85。

²¹ 其實，梁實秋所列舉的三段文字，已經不算最難懂的了。有人曾在魯迅的翻譯中找出這樣的一個例子：「這時候，要來講助那識別在三次元底的空间的方向的視覺底要素的相互的空间底距離的，誰都知道的眼睛的構造，大約是沒有必要吧。」（《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卷十五，頁225）參Lundberg, *Lu Xun as a Translator*, p. 221。另外，卜立德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所作的講座教授就職演講（1991年3月1日）中也曾徵引這個例子（David Pollard, "Translation and Lu Xun: The Discipline and the Writer," *Chinese University Bulletin Supplement* 21, p. 14）。

的幾個誤譯，又的確錯得很嚴重。²² 換句話說，他們二人都說得很對，那麼，究竟他們之間的分歧是不是很大，以致沒法解決？

其實，如果魯迅和梁實秋願意心平氣和，摒除成見去進行討論，不難會發覺，二人對於翻譯的看法，分歧並不是這麼大的。儘管從他們所寫的論爭文字看，魯迅主張直譯，梁實秋較重視譯文的可讀性——這確是二人的主要分歧所在，但長久以來被故意或無意忽略的，是他們一致的地方。

先看魯迅。魯迅以「硬譯」自嘲，顯然並不以這樣的翻譯手法為理想。梁實秋在攻擊魯迅的硬譯時，便曾徵引過魯迅在〈《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中的一個說法：

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佻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就是所謂「沒有出路」——了，所餘的惟一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²³

「中國文本來的缺點」，以致造成嚴重的翻譯難題，這是一個較複雜的問題，暫時不在本文討論；但魯迅承認自己能力不足，以致只能「硬譯」，這點卻很重要，因為這清楚顯示，魯迅並不以為硬譯是最好的翻譯方法，看來有點像嚴復徵引鳩摩羅什「『學我者病』」、「幸勿以是書為口實也」的味道。²⁴ 從魯迅的角度看，由於目前還沒有理想的翻譯出現，他只得硬譯下去，不過，他有這樣的信念：

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²⁵

這「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翻譯，才是魯迅理想的翻譯，這也就是他在〈「題未定」草〉一文中所說「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²⁶ 的意思：前者是不「硬」不「死」，後者是不「曲」不「誤」。

²² 《魯迅全集》，卷四，頁342-51。

²³ 〈《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載同上注，卷十，頁299。

²⁴ 嚴復認為自己翻譯《天演論》，用的是一種「達旨」的方法，「取便發揮，實非正法」，所以「幸勿以是書為口實也」。見嚴復：〈《天演論》譯例言〉，載王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五，頁1321。

²⁵ 《魯迅全集》，卷四，頁210。

²⁶ 同上注，卷六，頁352。不過，必須指出，魯迅在說完這些話後，他仍堅持說「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同上注，頁353）。

其實，在別的地方，魯迅也清楚說過，硬譯絕不是正確的翻譯方法。1933年8月2日，他在〈關於翻譯〉一文中說，「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著『硬譯』」。²⁷ 正如一位論者所說，這足以證明魯迅沒有將「硬譯」算在「好的翻譯」之中；²⁸ 此外，魯迅清楚知道直譯的問題所在，除了上引一段他自謙能力不足，只能硬譯的剖白外，早在1927年5月，他在翻譯《小約翰》後所寫的〈引言〉中也說過：「務欲直譯，文句也反成蹇澀。」又說自己的譯文「拙劣」，「冗長而且費解」；²⁹ 1929年4月，他翻譯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後，說自己所弄出來的譯本「只成一本詰屈枯澀的書」。特別值得強調的是，他說過這樣的話：「倘有潛心研究者，解散原來句法，並將術語改淺，意譯為近於解釋，才好。」³⁰ 這就是倒過來支持意譯了。他自己便曾經為許廣平在初學日語期間而試譯的《小彼得》作了一番修改，他正確地指出，初學外語而從事翻譯，缺點是「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譯，令讀者看得費力」，他「大加改譯了一通」，就是要令譯文「比較地近於流暢了」。³¹

那麼，梁實秋的翻譯標準又怎樣？毋庸置疑，梁實秋確是反對魯迅所主張的「硬譯」的。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裏，他強調了「譯書第一個條件就是要令人看得懂，譯出來而令人看不懂，那不是白費讀者的時力麼？」又說：「死譯一定從頭至尾的死譯，讀了等於不讀，枉費時間精力。」所以，他告訴讀者「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不過，應該強調，梁實秋反對「硬譯」，但並不就是要求或接受「曲譯」。〈論魯迅先生的「硬譯」〉開首是這樣的：「西澂先生說：『死譯的病雖然不亞於曲譯，可是流弊比較的少，因為死譯最多不過令人看不懂，曲譯卻愈看得懂愈糟。』這話不錯。」³² 另外，在同一篇文章裏，他還兩次說到這問題：「曲譯誠然要不得，因為對於原文太不忠實，把精華譯成糟粕。」又說：「曲譯固是我們深惡痛絕的。」³³

說得更清楚的還有兩封寫於兩三年後的通信，一是題為〈通訊一則——翻譯要怎樣才好？〉，另一封則是寫給葉公超的一篇〈論翻譯的一封信〉。在前者裏，梁實秋開列了幾個翻譯要點，除了還是對魯迅的翻譯加以嘲諷外，³⁴ 也有「『信而不順』與『順

²⁷ 同上注，卷四，頁554。

²⁸ 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295，注1。

²⁹ 〈《小約翰》引言〉，載《魯迅全集》，卷十，頁257。

³⁰ 〈《藝術論》小序〉，載同上注，頁295。

³¹ 〈《小彼得》譯本序〉，載同上注，卷四，頁151。關於魯迅其實也贊成意譯的論點，陳福康在《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中也指出過了。參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頁292。

³² 《新月》月刊第2卷第6、7號合刊，頁1；另外，陳源討論翻譯，見〈論翻譯〉，《新月》月刊第2卷第4號，頁1-12。

³³ 《新月》月刊第2卷第6、7號合刊，頁1。

³⁴ 在這封通信裏，梁實秋多次提到不要硬譯，又說不要以硬譯來「跨過自己看不懂的原文」；

而不信』是一樣的糟。硬譯不必即信，順譯亦不必即誤」的說法；³⁵ 至於第二封信，梁實秋更開列了「壞的翻譯」的幾個條件：

壞的翻譯，包括下列幾個條件：(一)與原文意思不符。(二)未能達出「原文的強悍的語氣」，(三)令人看不懂。三條有其一，便不是好翻譯；若三者俱備，便是最壞的翻譯。誤譯，曲譯，死譯，硬譯，都是半斤八兩。誤譯者不要笑硬譯，莫以為指責別人譯的硬便能遮蓋自己譯的誤；硬譯者也不要笑誤譯，莫以為指責別人譯的誤便能遮蓋自己譯的硬。³⁶

由此可見，梁實秋是既反對死譯，也反對曲譯的。換言之，在翻譯的標準上，他們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分歧，二人同樣要求一種「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翻譯。不過，在當時還沒有得到這樣的翻譯前，他們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權宜之計：魯迅主張硬譯，而梁實秋則希望能有更通順的翻譯。

既然魯迅和梁實秋在翻譯標準的問題上沒有本質上的分歧，那麼，為甚麼會爆發一場論戰？必須指出，他們這場論戰用上了十分強硬的字詞，甚至有時候算得上是惡毒的攻擊，為甚麼會這樣？

其實，魯迅那篇名文〈「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篇名，已經顯露出端倪：這裏有兩個原來並不相關的課題：(一)翻譯；(二)文學的階級性。事實上，他寫這篇長文，原來便是為了回應梁實秋兩篇不同的文章：〈論魯迅先生的「硬譯」〉及〈文學的階級性〉。既然我們已經證明了在翻譯方面二人的看法沒有本質上的差異，那麼，餘下來的問題才是關鍵所在，那就是「文學的階級性」。

顯然，魯迅也明白到，他跟梁實秋最嚴重的分歧，在於「文學的階級性」的問題。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裏，討論文學的階級性的部分，比討論翻譯的還要多。當然，這也是因為這問題更為複雜，涉及魯迅和梁實秋的文學觀以至政治觀，不是三言兩語便可以交代清楚的。

[上接頁296]

另外又談到不要信「雜感家」有關佛經翻譯的話(因為「雜感家」根本不懂佛經)，不要「以改良國文和翻譯攪成一團」，都是直接針對魯迅與瞿秋白有關翻譯的通訊而說的。見梁實秋：〈翻譯一則——翻譯要怎樣才好？〉，《益世報·文學週報》(天津)，1932年12月10日，錄自《魯迅梁實秋論戰實錄》，頁593-94。

³⁵ 同上注，頁593。

³⁶ 〈論翻譯的一封信〉，頁4。

由於篇幅關係，本文不可能深入討論二人的文學觀及政治觀。簡單地說，經歷了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爭後，魯迅這時候可以說是進入了「左傾」的階段。³⁷ 1929年10、11月間，透過共產黨員馮雪峯的聯繫，魯迅同意加入籌辦由中共所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0年2月16日，他參加了「上海新文學運動者底討論會」，據說在會上魯迅曾強調要為工農大眾而團結起來；³⁸ 3月2日，他出席了「左聯」的成立大會，發表了重要的講話〈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³⁹ 而〈「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也就是發表在3月出版的《萌芽》月刊上。

另一方面，梁實秋早年傾向於浪漫主義，與前期的創造社成員交往，且在創造社的刊物上發表過作品。他思想上最大的轉變，源於在留美期間，在哈佛大學研究院選修了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一門課。他最初是「抱著一種挑戰者的心情去聽講的」，後來卻完全信服於白璧德的人文主義。梁實秋自己說，他是「從極端的浪漫主義」，「轉到了多少近於古典主義的立場」。⁴⁰ 信奉了新人文主義的梁實秋，認定了文學活動是「有紀律的，有標準的，有節制的」，而文學的內容便是基本的普遍的人性，這樣，他不可能不跟主張文學具有階級性的左翼以至黨員作家發生衝突。

梁實秋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裏，完全否定了文學的階級性。他認為，文學是最基本的人性的表現，在這基本的人性上，資本家和勞動者並有甚麼的分別，他們對愛都有所追求，都有憐憫與恐怖的情緒，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所以，不少人生現象是超階級的。「把文學的題材限於個階級的生活現象的範圍之內，實在是把文學看得太膚淺太狹隘了」，而且，估量文學的價值，只應就文學作品本身立論，而不能聯繫到作者的階級去。

其實，梁實秋根本便否定了無產階級。他從字典裏證明，無產階級的人「就是國家裏最下階級的國民，他是沒有資產的，他向國家服務只是靠了生孩子」。他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以優勝劣敗來判定。「聰明才力過人的人佔優越的位置，無產者仍是無產

³⁷ 參Harriet Mills, "Lu Hsün, 1927-1936, The Years on the Lef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lumbia, 1963)。

³⁸ 魯迅1930年2月16日日記：「午後同柔石、雪峯出街飲加菲。」實指出席「上海新文學運動者底討論會」(《魯迅全集》，卷十四，頁810)；關於這次會議，參〈上海新文學運動者底討論會〉，《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載《左聯期資料》(東京：汲古書屋，1978年9月)，卷一，頁526-27。關於魯迅的發言，參馮雪峯1973年7月23日給龔濟民的信，見馬蹄疾：《魯迅講演考》(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48。

³⁹ 《魯迅全集》，卷四，頁233-38。

⁴⁰ 梁實秋：〈關於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載梁實秋：《文學因緣》(臺北：文星書店，1964年)，頁559-60。關於白璧德與梁實秋的思想，可參侯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臺北：中外文學月刊社，1974年)；Marian Gálik, "Liang Shih-ch'iu and Chinese New Humanism," in Marian Gálik, *The Genesi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Curzon Press, 1980), pp. 285-307。

者」。對於文學的鑑賞，他也是用一種精英主義的態度來評定：「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與文學無緣的。」他同意一般勞工農也需要娛樂，但只須提供一些通俗的戲劇、電影、偵探小說之類便可以了，不必作家去「逢迎羣眾」，去「俯就」。

梁實秋說他並不反對無產文學理論家以文藝當作他們的鬥爭武器，當作他們階級鬥爭的工具，但他不能承認這樣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他要求「看貨色」，於是，他抄錄了兩首蘇聯詩人的作品，他的結論是：「也許偉大的無產文學還沒有出現。」⁴¹

給「擠」看了一些馬列主義著作的魯迅，⁴²自然不能接受梁實秋的論點，他不認為文學具備階級性是一種外加的束縛，一句經常為人徵引的文字是：「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⁴³他也同意喜怒哀樂是人之情，但「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所以，他說：文學家雖自以為超階級，但他們也無意識地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而梁實秋的文章，便只能是資產家的鬥爭的武器了。

他還為無產階級文學辯護。他舉出了一些蘇聯作家的作品，認為「在中國這十一年中，就並無可以和這些相比的作品」，此外，他還指出：在他看過的理論裏，都不過說凡文藝必有所宣傳，並沒有主張只要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⁴⁴

我們都明白，像文學是否具有階級性、或是文學與宣傳有甚麼關係等問題，本來就不可能在一兩篇文章中圓滿解決的，不過，為甚麼一場原來可以在學理的範圍上進行的討論會演變成一場熾熱的論爭，以致雙方用上了極其惡毒的言詞來相互攻擊？而且，為甚麼這些問題又會跟翻譯扯上關係？

在這場論爭裏，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雙方都互相指責對方代表著一羣人來說話，換句話說，雙方都感到自己在跟一整個集團對抗著。表面看來，首先提出這指控的是魯迅，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裏，他劈頭的第一句便把矛頭指向「《新月》月刊團體裏的人們」，跟著，他又猛烈攻擊了新月社的集團性：「新月社的聲明中，雖說並無甚麼組織，在論文裏，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話，但其實是有組織的。」⁴⁵他要說的是，梁實秋代表了新月派：

⁴¹ 以上討論梁實秋有關文學的階級性的論述，來自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新月》月刊第2卷第6、7號合刊，頁1-13。

⁴² 〈《三閑集》序〉，載《魯迅全集》，卷四，頁6。

⁴³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頁204。

⁴⁴ 同上注，頁206。這也是魯迅一貫的看法，在與「革命文學派」論爭時，他說過這樣的話：「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然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文藝與革命〉，載《魯迅全集》，卷四，頁84）

⁴⁵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頁195。

但於我覺得有興味的，是上節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裏，有兩處都用著一個「我們」，頗有些「多數」和「集團」氣味了。自然，作者雖然單獨執筆，氣類則決不只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的，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又不至於一人雙肩負責。⁴⁶

這就是梁實秋所說「魯迅先生要駁我的文章，卻先要坐實我的背後有一個團體」的意思。⁴⁷ 儘管幾十年後梁實秋回顧這場論爭時曾一再強調，發表在《新月》上的文章，都「只是我個人的意見，我並不代表新月。我是獨立作戰，新月的朋友並沒有一個人挺身出來支持我」。⁴⁸ 不過，他好幾篇引起爭論的文章——〈文學與革命〉、〈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等，都是發表在《新月》月刊上的，加上他跟新月中人的緊密和良好關係，也難怪魯迅把他看成「新月派」的代表；事實上，正如梁實秋在回應的文章裏說，魯迅一下子把「『新月社的人們』全扯進來了」。⁴⁹ 「新月派」跟魯迅一向關係惡劣，其中徐志摩和陳源更是魯迅的「頭號敵人」，但更嚴重的是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那麼，魯迅又代表了甚麼集團？梁實秋在最早的兩篇文章裏已隱隱地說出了魯迅的「派別」。表面上，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裏，梁實秋並沒有提到魯迅的名字；另一方面，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裏，他也沒有提及到魯迅跟任何集團的關係。不過，兩篇文章一併發表在同期的《新月》月刊上，而且，在討論魯迅的硬譯時，他特別徵引了魯迅翻譯盧那卡爾斯基的兩部作品作例子。必須指出的是，在談論文學的階級性時，他猛烈攻擊無產階級文學，也著意批評了一些翻譯成中文的無產階級文學理論書籍，第一個例子便是盧那卡爾斯基，這能說是巧合嗎？

如果我們說，在最早的文章裏，梁實秋還只是在暗示，在其後所寫的文章裏，他便很清楚的點出了魯迅與無產階級文學派的關係了。

在〈答魯迅先生〉裏，梁實秋徵引了刊登〈「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萌芽》月刊的〈編輯後記〉中的一句，「我們由魯迅先生的手加以詳細的反駁了」，來證明魯迅代表了一個集團。不過，梁實秋這篇文章最特別的地方，在於他非常突兀地在篇末加入了一段有關「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報導。⁵⁰ 表面上，他是從新月派的成員

⁴⁶ 同上注，頁197。

⁴⁷ 〈答魯迅先生〉，《新月》月刊第2卷第9號（1929年11月10日〔延誤〕），頁3。

⁴⁸ 梁實秋：〈憶「新月」〉，載梁實秋：《關於魯迅》（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8年再版），頁147。

⁴⁹ 〈答魯迅先生〉，頁3。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裏，魯迅確是把新月派的人全扯進去：「徐志摩先生的詩，沈從文，凌叔華先生的小說，陳西滢（即陳源）先生的閑話，梁實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優生學，還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頁197-98）

⁵⁰ 〈答魯迅先生〉，頁7。

也爭取自由談起，但實際上可不是這樣簡單。梁實秋要借助魯迅參加了由中共所操控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報導，來指控魯迅與中共有密切的關係，甚至暗示魯迅有可能直接參與了中共所領導的反國民政府活動；⁵¹ 下面的一段文字寫得十分露骨：

有人譏誚我們要求的不過是思想自由，有人譏誚我們只是在紙上寫文章而並不真革命。這些譏誚，我們都受了。講我自己罷，革命我是不敢亂來的，在電燈桿子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我是不幹的，到報館門前敲碎一兩塊值五六百元的大塊玻璃我也是不幹的，……好了，現在另有所謂「自由運動大同盟」了，「議決事項甚多」，甚多者，即不只發宣言一樁事之謂也。他們「奮鬥」起來必定可觀，魯迅先生恐怕不會專在紙上寫文章來革命。⁵²

如果我們把這些指控聯繫到當時的政治環境，便不能不對梁實秋的做法提出譴責。我們知道，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突然發難，實施清黨，大舉逮捕及處死共產黨員。從那時候開始，與共產黨有關的人，都會有隨時被捕的可能，甚至更會有生命的危險——1931年，五名「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盟員的被捕和被殺(即所謂的「左聯五烈士」事件)，⁵³ 充分顯示當時政治形勢的嚴峻。上引梁實秋的一段引文，正面地指控魯迅與共產黨關係密切，其中談到「武裝保衛蘇聯」，敲碎報館的大玻璃，以及說魯迅「不會專在紙上寫文章來革命」，在在是要向當時的國民政府提示，借助政治勢力來進行干預，實際上就是要置魯迅於險境。梁實秋這種做法還在別的地方用上了；⁵⁴ 平情而論，這跟他一向自稱為自由主義者、能夠容忍不同聲音的宗旨是相違背的。⁵⁵ 對於梁實秋的這種行徑，魯迅深表不滿。他指出，這無異是在向政府告密，

⁵¹ 當時，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會被認定跟共產黨有密切的關係。魯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報》的通信上便說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買收』」（魯迅：〈「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載《魯迅全集》，卷四，頁247）。

⁵² 〈答魯迅先生〉，頁3。

⁵³ 關於「左聯五烈士」事件，可參看T. A. Hsia, "Enigma of the Five Martyrs," in T. A. Hsia,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pp. 163-233; 王宏志：〈也談「左聯五烈士」〉，載王宏志：《思想激流下的中國命運——魯迅與「左聯」》（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1年），頁261-78。

⁵⁴ 例如在〈「資本家的走狗」〉中，有「如何可以到x x黨去領盧布」一句（《新月》月刊第2卷第9號，頁10）。正如魯迅所說，「那故意暗藏的兩個x，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產』這兩字」（魯迅：〈「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頁247）。

⁵⁵ 例如梁實秋在〈關於魯迅〉一文裏，說過他絕不贊成把魯迅的作品列為禁書，他說他最服膺服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拚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關於魯迅》，頁2）此外，亦有學者查閱出在三十年代梁實秋曾發表過三篇文章，批評南京國民政府申禁普羅文學書籍的做法。參劉麗華：〈從新發現的三篇佚文看梁實秋對「普羅文學」的
〔下轉頁302〕

「指示著凡主張『文學有階級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擁護蘇聯』，或『去領盧布』的勾當」。魯迅非常憤怒地痛罵梁實秋「為主子嗅出匪類」，「這職業，比起『劊子手』來，也就更加下賤了」。⁵⁶

既然確認了二人所代表的「派別」，我們可以在這裏稍為看看這兩個「派別」的關係。

在中國大陸1949年以後出版的現代文學史裏，「新月派」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名詞，一般都被放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或「左翼文藝運動」的一章裏面，題為「對新月派的鬥爭」，有的則冠上「買辦資產階級」的字眼，有些甚至把它與「法西斯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放在一起，加上「對抗」、「鬥爭」、「批判」等字眼。從這些文學史，我們可以綜合出在中共的論述裏，新月派負有甚麼的「罪狀」：（一）新月派的前身是擁護帝國主義者和北洋運閥的「現代評論派」，新月派繼承了「現代評論派」大肆宣傳英美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二）新月派投靠和依附國民黨，是「反人民」、「反革命」的組織；（三）新月派宣傳人性論，反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攻擊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⁵⁷ 我們不在這裏審核這些指控是否正確，⁵⁸ 但回到三十年代的左翼以至共產黨員作家去，不難發覺，他們也抱有近似的看法。

〔上接頁301〕

態度），《魯迅研究動態》1989年第5、6期合刊（1989年5月），頁59-63。在其中的一篇文章裏，梁實秋說：「凡以政治力量或其他方式的暴力來壓迫文藝的企圖，我反對。」（梁實秋：〈文藝自由〉，《益世報·文學周刊》〔天津〕，1933年10月28日，錄自劉麗華：〈從新發現的三篇佚文看梁實秋對「普羅文學」的態度〉，頁59）很可惜，似乎上引他對魯迅的指控，便是有借助政治力量來壓迫文藝的企圖。

⁵⁶ 魯迅：〈「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頁247。應該指出，魯迅用上「下賤」這樣的字眼是較少的，他曾經告誡左翼評論家「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參魯迅：〈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載《魯迅全集》，卷四，頁451-54。此外，在這場論爭裏，還有一個小小的細節是頗為有趣的，也足以反映出魯迅當時和梁實秋的論戰，已到了毫不冷靜及理性的地步。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裏，魯迅為了駁斥梁實秋所說「終身窮苦的約翰孫博士，他的志行高潔吐屬文雅比貴族還有過無不及」的說法，說了這樣的一段話：「至於約翰孫博士終身窮苦，而志行吐屬，過於王侯者，我卻實在不明白那緣故，因為我不知道英國文學和他的傳記。」（頁205）不過，魯迅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約翰孫的事情呢？早在1903年，他為自己的一篇翻譯小說《月界旅行》寫〈辨言〉時，裏面便有「瓊孫之『福地』」的一句，「瓊孫」便是約翰孫（《魯迅全集》，卷十，頁151）。

⁵⁷ 參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2冊，頁21；田仲濟、孫昌熙（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13；劉綏松：《中國新文學史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上卷，頁223-29。

⁵⁸ 我曾撰寫過一篇長文，討論中國大陸出版的新文學史對新月派不公平的論述：〈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文學團體？——中國大陸文學史裏的「新月派」〉，載王宏志：《文學與政治之間——魯迅·新月·文學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頁243-85。

我們知道，1928年初，魯迅初從廣州抵上海不久，便為創造社及太陽社成員圍攻，這就是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學論爭」。這時候，魯迅是「革命文學」陣營的敵人，受到了極其猛烈及嚴酷的批評。⁵⁹不過，到了《新月》月刊的出現，形勢便開始產生變化。一方面，新月派對左翼文學構成了強大的挑戰力量；另一方面，新月派的主要成員一向以來跟魯迅已有嫌隙，所以，在某一程度上來說，新月派可算是左翼作家跟魯迅的共同敵人，最後，大概從1929年中開始，他們願意攜手建立一條統一戰綫來。

《新月》月刊的發刊詞〈「新月」的態度〉，由徐志摩執筆，被認為是向左翼作家挑戰的檄文，裏面提出文學必須符合「尊嚴與健康」的兩大原則，並且列舉了文壇上十三種破壞這兩項原則的派別，其中不少就是「革命文學派」所有的特徵。⁶⁰〈「新月」的態度〉發表後，「革命文學派」感受到威脅，先由創造社的彭康寫了一篇〈甚麼是「健康」與「尊嚴」——「新月的態度」底批評〉，⁶¹然後馮乃超也發表〈冷靜的頭腦——評駁梁實秋的《文學與革命》〉，⁶²魯迅發表〈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⁶³〈「好政府主義」〉⁶⁴及〈「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等，都是左翼作家對新月派的集體鬥爭。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知道新月派是左翼作家誓言打擊的對象，而梁實秋則被視為新月派的代表理論家及批評家，特別是他的確發表過好幾篇批評無產階級文學的文章，他成為攻擊的目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不過，為甚麼這樣的一場政治論爭會跟翻譯扯上關係？

四

除了上面所討論過的好幾篇文章外，梁實秋還有一篇值得特別注意的文章，就是〈所謂「文藝政策」者〉，原因是他在這篇文章裏清楚地把翻譯和政治聯繫起來。在文章裏，

⁵⁹ 今天，中國大陸流行的說法是，這是一場革命陣營的內部鬥爭。我不同意這個看法，參王宏志：〈革命陣營的內部論爭？分析1928年革命文學論爭魯迅成為攻擊目標的原因〉，將發表於《現代中國文學學報》第2期。關於這場論爭，主要的文章都收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⁶⁰ 《新月》月刊第1卷第1號（1928年3月10日），頁3-10；關於這篇發刊詞跟左翼文壇的關係，可參侯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頁122。

⁶¹ 《創造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10日）轉引自《「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頁526-35。

⁶² 《創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載引自同上注，頁550-69。

⁶³ 《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載《魯迅全集》，卷四，頁159。

⁶⁴ 《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載同上注，頁243-44。

梁實秋仍然繼續抨擊了魯迅的硬譯，但這不是文章的重點所在，重要的部分是他對魯迅翻譯「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通過的文藝政策的動機提出質疑：「『文藝政策』，誰的文藝政策？是『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的。這一點要首先交代明白。」他一方面指出，中國的「普羅文學」「左翼作家」的口吻多與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相合，另一方面，他又強調這並非出於偶然，「恐怕還是一般人把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當作文藝的聖旨，從而發揮讚揚罷？」至於魯迅的翻譯，梁實秋以一反問句來提出指責：

如果魯迅生先硬譯的這一部書，事實上的效果不是供給一般注意文學的人做參考，而是供給了一般年青的偏激的文人以不純正的文藝理論，那麼，這一部硬譯的書於現在的中國，未必是有益罷？⁶⁵

在這裏，梁實秋實際指控了魯迅翻譯左翼文學理論，是為共產黨宣傳作出貢獻，而由此，我們便明白為甚麼魯迅與梁實秋的爭論會牽涉到翻譯上去：梁實秋攻擊魯迅的翻譯，是因為魯迅大量翻譯了馬列主義的作品，他的動機是政治性的。

我們說過，從晚清開始，魯迅便認定了翻譯外國作品能夠幫助國民性的改革。在他還沒有信奉馬列主義前，他的翻譯活動都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爭，一方面令他自己開始大量閱讀馬列主義的作品，以致信服了其中的觀點，修正自己的看法；但另一方面，從他對手——那些自稱「革命文學派」以至「無產階級文學派」的左翼以及黨員作家和理論家——在論爭中所暴露的弱點，使魯迅覺得有必要去多翻譯一些馬列理論著作。他在回應梁實秋的「硬譯」指責時這樣說：

從前年以來，對於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我於是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⁶⁶

跟著，他就用上了那著名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的比喻，「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來說明自己翻譯馬列主義作品的原因，他的意思是要自己「於社會上有些用處」。自然，這種翻譯觀跟從前的沒有分別，仍然是一種功利實用的態度，只是翻譯的選材有所不同罷了。他當時的願望是這樣的：

我只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⁶⁷

⁶⁵ 〈所謂「文藝政策」者〉，《新月》月刊第3卷第3期(出版日期缺)，頁3。

⁶⁶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頁209。

⁶⁷ 魯迅：〈文學的階級性〉，載《魯迅全集》，卷四，頁127。

魯迅首先選擇翻譯《文藝政策》，便是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⁶⁸ 但這所謂的「各派」，也只不過是蘇聯共產黨黨中央以及無產階級作家大會所通過的決議。對於蘇聯的文藝政策，梁實秋是極為鄙夷的。他認為裏面並沒有甚麼理論根據，有的只是幾種「卑下」的心理：「一種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來剝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種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來求文藝的清一色。」⁶⁹ 這自然是為梁實秋所不滿意的。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裏，有一處十分有趣的地方。梁實秋提到魯迅從前的翻譯：「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字，例如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但是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格了。」⁷⁰ 接著，他便舉出魯迅新近翻譯盧那卡爾斯基的譯文為例，證明魯迅的翻譯「離『死譯』不遠」。

對於梁實秋的说法，魯迅作了回應，他從原著本身的差異來作解釋：梁實秋能看懂《苦悶的象徵》，是因為「原文原是易解的緣故」。這解釋不無道理，但重要的是，在翻譯方法或風格方面，魯迅並不承認有任何改變：「我的譯《苦悶的象徵》，也是和現在一樣，是按板規逐句，甚至於逐字譯的。」⁷¹ 我們只要看看下面從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徵》摘錄出來的句子，便可證明魯迅的說法是準確的：

永是不願意凝固和停滯，避去妥協和降伏，只尋求著自由和解放的生命的力，是無論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總是不住地從裏面熱著我們人類的心胸，就在那深奧處，烈火似焚燒著，將這炎炎的火焰，從外面八九層地遮蔽起來，巧妙地使全體運轉著的一副安排，便是我的外底生活，也是在稱為「社會」這一個有機體裏，作為一分子的機制(mechanism)的生活。⁷²

這段譯文，其實也同樣是需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綫索位置」的。此外，我們也可以看看魯迅在1924年11月為《苦悶的象徵》的譯本所寫的〈引言〉中的一段文字：

這譯文雖然拙澀，幸而實質本好，倘讀者能夠堅忍地反復過兩三回，當可以看見許多很有意義的處所罷：這是我所以冒昧開譯的原因，——自然也是太過份的奢望。⁷³

仔細的看這段文字，不難感覺到它跟上面梁實秋所徵引魯迅的〈《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作為攻擊目標的一段文字很相像。既然這樣，為甚麼梁實秋可以接受前者，卻不能接受後者？上文說過，從晚清《域外小說集》的翻譯開始，魯迅便採取直譯的手法，所

⁶⁸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頁210。

⁶⁹ 〈所謂「文藝政策」者〉，頁3。

⁷⁰ 〈論魯迅先生的「硬譯」〉，頁2。

⁷¹ 《魯迅全集》，卷四，頁200。

⁷² 《魯迅全集》（1973年版），卷十三，頁23。

⁷³ 〈《苦悶的象徵》引言〉，載《魯迅全集》，卷十，頁232。

以根本不存在風格改變的問題；問題是：梁實秋願意接受魯迅翻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原因是廚川白村是日本文藝理論家，他的著述多介紹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美文學和文藝思潮，⁷⁴ 這在梁實秋來說是完全可以接受甚至認同的，但他卻不能接受大量的馬列主義理論著作給翻譯成中文。由此可見，翻譯風格只不過是梁實秋用以攻擊魯迅的翻譯活動的藉口罷了。幾十年後，梁實秋回顧這場論爭時，說了這樣一段很重要，但卻很少人提到的文字：

就在這個時候，他〔魯迅〕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黨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卻。⁷⁵

當然，梁實秋在毫無證據下懷疑以至推想《文藝政策》不是魯迅所譯，是很不妥當的做法；事實上，只要我們去讀讀魯迅在三十年代「左聯」時期所翻譯的其他左翼文藝理論著作，便不難確定梁實秋的推斷是錯誤的——魯迅後期的翻譯跟《文藝政策》極其相似。但重要的地方在於梁實秋認定了《文藝政策》的翻譯，足以表明魯迅傾向於共產黨，⁷⁶ 這正正是他突然向魯迅的翻譯發動攻擊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他在〈答魯迅先生〉中說〈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是兩篇「各自獨立，毫無關聯」的文章，⁷⁷ 只不過是一種砌詞罷了，而由此我們也可以明白為甚麼魯迅在作出反駁時會把兩個表面不相關的課題放在同一篇文章裏處理。

另一方面，再細看魯迅其他有關翻譯的討論，不難發現，魯迅也同樣地利用了翻譯標準作藉口，攻擊一些在政治上他不能認同的人。在這裏，我們可以回到魯迅所說梁實秋的「徒弟」趙景深和「徒孫」楊晉豪的問題。

必須指出，魯迅所說趙景深和楊晉豪是梁實秋的「徒弟」和「徒孫」的說法是不準確的，他的目的是要給人一種「一脈相承」的感覺，但事實上，從現在所見到的資料看，梁實秋跟趙景深和楊晉豪是毫無關係的。

⁷⁴ 關於魯迅對廚川白村的譯介和評價，可參劉柏青：〈魯迅與廚川白村〉，載劉柏青：《魯迅與日本文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122-45。

⁷⁵ 《關於魯迅》，頁4-5。

⁷⁶ 在這裏，梁實秋的说法很含糊，「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了」，究竟是指魯迅借翻譯《文藝政策》來向共產黨表明自己願意「傾向於共產黨」，還是說他的翻譯《文藝政策》，清楚地向外人表明了他已經「傾向於共產黨」？不過，兩個說法也不影響我們對梁實秋所認定魯迅翻譯左翼文藝理論著作的動機的理解。

⁷⁷ 〈答魯迅先生〉，頁1。

首先，在梁實秋所寫有關這次論爭以及其他的回憶性文字裏，並沒有片言隻字提及過趙景深。不要說趙景深，我們在上面已指出過，他根本認為其他新月派的友人也沒有參與這場論爭，更何況原是文學研究會成員的趙景深？另一方面，趙景深長久以來都十分注意收集現代中國文壇史料，被人視為跟錢杏邨同為這方面的專家。⁷⁸ 對於梁實秋和魯迅的論爭，他顯然是知道的，可是，他從未置一詞；而且，他在四十年代中曾經出版過《海上集》、⁷⁹《文壇憶舊》、《文人印象》及《文人剪影》四部回憶現代中國文壇和作家的書，加上在八十年代他又再出版了一本《文壇回憶》，⁸⁰裏面寫到的作家超過一百人，但卻完全沒有提及梁實秋。至於楊晉豪，⁸¹雖然他是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而梁實秋也曾在中央大學任教，可是，當楊晉豪進入中央大學時，梁實秋已經轉到青島大學去了，不可能做過楊晉豪的老師。不過，也許趙景深跟楊晉豪是認識的：楊晉豪後來任北新書局的編輯，而趙景深跟北新有很密切的關係，但那已經是楊晉豪畢業後工作時的事，跟1930至1931年間的翻譯論爭扯不上關係。

既然這樣，為甚麼魯迅又會把趙景深與楊晉豪說成是梁實秋一派，在翻譯論爭中把他們一併罵倒？據趙景深說，早在1927年春，魯迅剛抵廣州不久，他便跟魯迅見過面，而在此之前，他也在《語絲》上跟魯迅通過一次信。回到上海後，他們的接觸比較頻密，趙景深曾向魯迅借書和贈書，又投稿到魯迅主編的《奔流》上去。1930年4月19日，趙景深跟北新書店老闆李小峯的妹妹李希同結婚，魯迅曾往道賀及吃晚飯；⁸²似乎他對趙景深不會是十分憎厭的——而那時候，魯迅與梁實秋的翻譯論戰早已開展了。

那麼，為甚麼魯迅又要大罵趙景深？當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曾經說過在翻譯裏「最要緊的是譯得順不順」的話，另外，就是那著名的「牛奶路」(Milky Way)的翻譯，魯迅除了在〈幾條「順」的翻譯〉裏罵了趙景深外，也專門寫了〈風馬牛〉來大加批評，⁸³而後來在〈關於翻譯的通信〉裏，也譏笑了牛奶路的翻譯，態度之激烈，一

⁷⁸ 這是一位讀者在四十年代寫給趙景深的信中所寫的，見趙景深：〈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書目〉，載趙景深：《文壇憶舊》（上海：北新書局，1948年），頁222。趙景深自己也承認「對於現代中國文學頗為留意」（同上，頁223）。

⁷⁹ 《海上集》（上海：北新書局，1946年）。

⁸⁰ 《文壇回憶》（重慶：重慶出版社，1985年）中的上編是趙景深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寫的文章，但中、下編則是重印了《文人印象》及《文人剪影》。

⁸¹ 關於楊晉豪生平的資料很少，除《魯迅全集》卷四頁344上注3的簡單介紹外，還有是陳玉堂：《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277。

⁸² 魯迅1930年4月19日日記，〈魯迅全集〉卷十四，頁820。亦可參趙景深：〈魯迅給我的指導、教育和支持〉，載《文壇回憶》，頁3-8。

⁸³ 《魯迅全集》，卷四，頁346-48。

點也不像在進行一些學術性的討論，實在使人感到意外。⁸⁴ 原因究竟在哪裏？當事人趙景深在幾十年後——魯迅在中國大陸的地位異常地崇高和鞏固後——說出了這兩段話：

當時我並不是反對魯迅所譯的科學文藝理論；我在《文學概論》和《文學概論講話》中都大量引用過魯迅所譯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

恐怕魯迅不僅是由於翻譯問題而批評我，而是由於我有一次在國民黨市政府的一次宴會上說錯了話而批評我。我膽子小，沒有加入左聯，雖然在《現代文學》上偏重革命派的著作，但也刊登頹廢派和別的派別的著作，雖然這刊物只出了半年六冊，就被國民黨禁止，究竟還只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同情革命分子，不是對於革命文藝非常熱愛。總之，這段時間內我走了下坡路。⁸⁵

在這段文字裏，趙景深解釋了魯迅對他不滿的原因：在國民黨市政府的宴會上說錯話。這是甚麼意思？魯迅在一封寫給年青友人姚克的信中，說出了這樣的一件事：

前幾天，這裏的官和出版家及書店編輯，開了一個宴會，先由官訓示應該不出反動書籍，次由施蛰存說出仿檢查新聞例，先檢雜誌稿，次又由趙景深補足可仿日本例，加以刪改，或用 x x 代之。他們也知道禁絕左傾刊物，書店只好關門，所以左翼作家的東西，還是要出的，而拔去其骨格，但以漁利。……大約施、趙諸君，此外還要聯合所謂第三種人，發表一種反對檢查出版物的宣言，這是欺騙讀者，以掩其獻策的秘密的。⁸⁶

換言之，趙景深所說的「說錯了話」，是指他向國民黨「獻計」，禁制左翼書籍的出版。自然，魯迅對此是深惡痛絕的。不過，這跟1929年的「翻譯論爭」不可能扯上任何關係，趙景深的解釋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擾亂視聽，原因是：魯迅所說的宴會，發生在1933年10月底11月初——這封給姚克的信是寫在1933年11月5日的，而那宴會是在「前幾天」開的，這跟翻譯論爭毫無關係。

那麼，究竟問題出在哪裏？應該指出，早在翻譯論爭爆發以前，魯迅已把趙景深看成是跟梁實秋的一丘之貉。1929年7月，他寫過一封信給章廷謙，信中提到趙景深：

⁸⁴ 關於「牛奶路」的翻譯問題，今天已有人願意指出趙景深的譯法並非很嚴重的錯誤，反而如果趙景深當時把Milky Way譯成「銀河」，引來不正確的理解和聯想，問題會更大。參謝天振：〈文學翻譯與文化意象的傳遞〉，載謝天振：《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臺北：業強出版社，1994年），頁240-45。

⁸⁵ 趙景深：〈魯迅給我的指導、教育和支持〉，頁8-9。

⁸⁶ 魯迅1933年11月5日給姚克信，載《魯迅全集》，卷十二，頁254-55。

青島大學已開。文科主任楊振聲，此君近來似已聯絡周啟明之流矣。此後各派分合，當頗改觀。語絲派當消滅也。陳源亦已往青島大學，還有趙景深沈從文易家鉞之流云。⁸⁷

我們知道，青島大學是由蔡元培任籌備委員會主席的，但實際籌備工作則由楊振聲負責，楊更為該校首任校長，1930年，他便邀約了聞一多和梁實秋往青島大學任教。雖然魯迅寫上面的一封信時梁實秋還沒有去青島大學的意圖，而趙景深始終也沒有去過青島大學教書，但從魯迅的信看，他早已把趙景深看成是陳源一派了。至於魯迅往賀趙景深的婚禮，看來只是因為魯迅與李小峯的交情——李小峯是北新書局的老闆，而魯迅不少書籍都是在北新出版的。他當天的日記是這樣寫的：「李小峯之妹希同與趙景深結婚，因往賀，留晚飯，同席七人。」⁸⁸重點也是放在李小峯上，而不是說趙景深與李希同結婚，可見他並不把趙景深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另外，在一封信寫於1932年的信裏，魯迅在談到北新書局時，使用上了「趙景深駙馬」這樣的說法，⁸⁹可見他對趙景深的不滿。

但在上引的第一段文字裏，趙景深談到魯迅翻譯「科學文藝理論」，並解釋及辯護說自己沒有反對魯迅的做法，這便涉及了翻譯的問題，他實在是回應魯迅的指責。魯迅在一封寫給瞿秋白討論翻譯問題的信裏，對趙景深有這樣的批評：

就拿趙景深老爺來做例子罷，他一面專門攻擊科學的文藝論譯本之不通，指明被壓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卻又大發慈悲，說是這樣的譯本，恐怕大眾不懂得。⁹⁰

顯然易見，這情況就跟梁實秋跟魯迅罵戰的完全一樣。在魯迅眼裏，趙景深和梁實秋是同一伙的，二人都強烈反對翻譯馬列主義理論書籍，二人都同是無產階級的敵人，因此，他提出了趙景深是梁實秋「徒弟」這種比喻性的說法。對於這點，趙景深其實是心中有數的，上引的第二段文字裏，趙景深突然提到魯迅翻譯「科學文藝理論」，且為自己提出辯護，就是這個緣故；此外，他對自己沒有加入「左聯」的原因支吾其詞，且承認「不是對革命文藝非常熱愛」，在這時期「走了下坡路」等，都在在證明了趙景深清楚明白在魯迅當時的心目中，他自己不會是同一陣營中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明白為甚麼魯迅會對趙景深這樣的咄咄相逼，毫不容情。

楊晉豪的情形更是簡單明確。人民文學出版社為1981年版的《魯迅全集》所作的注釋，便清楚顯示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⁸⁷ 魯迅1979年7月21日給章廷謙信，載同上注，卷十一，頁678。

⁸⁸ 同上注，卷十四，頁820。

⁸⁹ 魯迅1932年6月18日給臺靜農信，載同上注，卷十二，頁91-92。

⁹⁰ 同上注，卷四，頁380。

楊晉豪 上海奉賢人，當時南京中央大學學生。他在《社會與教育》第2卷第22期(1931年9月)發表〈從「翻譯論戰」說開去〉一文，攻擊當時馬列主義著作和「普羅」文學理論的譯文「生硬」，「為許多人所不滿，看了喊頭痛，嘲之為天書」。又說「翻譯要『信』是不成問題，而第一要件是要『達』！」⁹¹

這注釋先說楊晉豪反對普羅文學理論，然後才談到他的翻譯標準，由此可見，對於楊晉豪的評價，確也是「政治先行」的。

其實，要確切理解這場論爭的性質並不困難，瞿秋白跟魯迅討論翻譯問題的時候，曾經這樣批評過趙景深所提的標準：

他顯然是暗示的反對普羅文學(好個可憐的「特殊走狗」)！他這是反對普羅文學，暗指著普羅文學的一些理論著作的翻譯和創作的翻譯。這是普羅文學敵人的話。⁹²

這便是魯迅對梁實秋反對他的翻譯的認知：反對翻譯普羅文學理論及創作的翻譯，就是普羅文學的敵人，這樣，梁實秋毫無疑問就是普羅文學的敵人。

五

今天，不少翻譯理論家都關注到翻譯的政治功能，甚至有「翻譯就是一種政治性行為」的說法。當然，這些理論中所談的「政治」，是一個比較廣義的說法，指的是翻譯對於譯入語文化的衝擊，以及因而帶來的改變。⁹³ 魯迅與梁實秋在1929至1930年間爆發的一場翻譯論爭，也具備了政治的意義，而雙方的政治目標是非常明確的。魯迅與梁實秋在1929至1930年間爆發的一場翻譯論爭，正好就是這個「翻譯就是一種政治性行為」說法的最佳注腳。從魯迅以至瞿秋白等左翼翻譯家的角度看，翻譯具有重要的政治使命，因為翻譯蘇聯的理論著作，肩負了向中國讀者及羣眾宣傳馬列主義的任務，也自然是他們整個的政治運動及鬥爭中的一部分。對於這點，他們是毫不諱言的。瞿秋白說過這樣的話：

翻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名著，並且有系統的介紹給中國讀者，……這是中國普羅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雖然，現在做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個人

⁹¹ 同上注，頁344，注3。

⁹² 瞿秋白：〈論翻譯〉，載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學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卷一，頁506-7。

⁹³ 參 Román Alvarz and Carmen-África Vidal, "Translating: A Political Act," in Román Alvarz and Carmen-África Vidal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pp. 1-9。

[魯迅]和Z同志[曹靖華]的努力；可是，誰能夠說：這是私人的事情？！誰？！《毀滅》《鐵流》等等的出版，應當認為一切中國革命文學家的責任。每一個革命的文學戰綫上的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個勝利；雖然這還只是小小的勝利。⁹⁴

因此，對於那些批評他們的翻譯活動的人，魯迅及瞿秋白等會視之為對他們政治活動的攻擊。在與梁實秋的論爭裏，這樣的理解是準確的。梁實秋不能認同共產主義思想，且的確對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作過攻擊，特別是他清楚認識到左翼作家翻譯活動的政治動機，因而對魯迅等把蘇聯的理論著作翻譯過來視為一種敵對的政治行動，必須加以撻伐。在1929年底出現的一場翻譯論爭裏，雖然表面上爭論的是翻譯的標準問題，但問題的核心並不在這裏，瞿秋白也曾經批評過魯迅的翻譯「還沒有做到『絕對的白話』」，也批評過他要求讀者容忍不順的翻譯，⁹⁵ 但卻沒有出現像跟梁實秋那樣的筆戰。因此，魯迅與梁實秋的論爭雖然以翻譯標準作包裝，實際上那只不過是一個雙方相互攻擊的切入點，他們始終沒有從學理上去嘗試解決問題，卻出現了惡毒的人身攻擊，這是其他有關翻譯標準的討論所沒有的。結果，經過猛烈的爭論後，翻譯標準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反而卻牽涉了文學的階級性、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等問題，以至「武裝保衛蘇聯」、「去X X黨領盧布」、「『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等都出來了。這可不就是「翻譯是一種政治性行爲」的意思嗎？

1997年11月

⁹⁴ 瞿秋白：〈論翻譯〉，頁504。

⁹⁵ 同上注，頁507-9。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ransl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On the Debate between Lu Xun and Liang Shiqiu in 1929

(A Summary)

Wong Wang-chi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dig out the real causes of the heated debate between Lu Xun and Liang Shiqiu in 1929.

On the surface, the quarrel was centred on the criteria for translation. Liang attacked Lu Xun for translating too literally, to a stage that the translations, which Liang called "dead translations," were totally unintelligible to any reader. Lu, while admitting that he was translating in a "hard" way, defended that he was just being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s, hence to the readers. He, in return, accused Liang for sacrificing accuracy for fluency. Coming along with these arguments were ridicule, derision and malicious personal attacks.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was no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Both would like to have an accurate and yet readable translation. Their real difference lay in their political stances. Lu Xun, by 1929, had turned left. Supporting the Communist cause, he started to translate Marxist literary theories and works. On the other hand, Liang had become a close follower of Irving Babbitt, master of Neo-Classicism, after his Harvard years. He could not tolerate the political agenda behind Lu Xun'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e main body of the present paper consists of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both parties, attempting to explain how translation,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1920s and the beginning of 1930s, was related to the class struggle of the tim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